

共和国元帅的1921

□董俊林

革命，是贺龙在军事斗争中的深刻认识。在旧军队里，虽然从营长当到师长，但他看不到中国革命的希望。1921年9月，25岁的贺龙奉命率部进驻湖南桃源。驻防期间，一位名叫花汉儒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向他宣讲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贺龙深受启发，在不断交流中获知“中国有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刚刚成立了共产党”“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共产党了”。

1921年10月，24岁的叶剑英以大总统随员身份随孙中山出巡广西，被分配到幕僚处负责参谋事宜。他聆听了孙中山的《军人精神教育》演讲，深受触动，提出“必须给这些军队的将士以政治上的教育”“树立新军队的精神”等见解。他在军官教导团担任教官，参加军队整训工作，训练北伐部队下级军官，之后出任江防舰队护航营营长。这一年，孙中山在广西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商议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的政党和创办军校、建立革命武装问题。这为叶剑英之后选择成为共产党人并走上革命道路作了铺垫。

在学校思考救国为民之道

19岁的罗荣桓正在长沙协均中学读书，他学习认真刻苦，经常废寝忘食。校长柳直荀是毛泽东等发起和组织的新民学会会员，他不断将湖南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状况向同学们介绍，罗荣桓深受鼓舞，认识到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并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这年暑假，罗荣桓学习长沙学生联合会的榜样，邀集同学在家乡南湾街上的饭铺里，成立了土梦学友联合会并被公推为会长。联合会以主要力量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举办农民夜校，开设国文、算术课程，旨在“联络感情，增长知识，移风易俗，增进社会”。在教学中，罗荣桓宣传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受到农民的欢迎。

“民众何以贫穷？”“国家何以危亡？”“中国的出路何在？”这是青年徐向前不断思考的问题。在太原国民师范学习毕业后，20岁的徐向前被分配到山西省阳城县太原第四小学当教员。从学生到教员，让他意识到了自己对社会启蒙者的责任。他期望通过努力，培养学生“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然而由于秉性刚直，他被无故辞退。之后又在五台县一所小学教书，因为坚持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反对封建思想，再遭校方辞退。几经挫折之后，徐向前离家投考黄埔军校，开启了革命征程。

在国外参加爱国运动

“我们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20岁的陈毅身在法国，作为四川学生代表参加了争取勤工俭学学生“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为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出卖筑路权的秘密借款，他与周恩来、蔡和森等一起，发动和领导了留法学生爱国运动并最终取得胜利，斗争中陈毅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学生爱国运动遭到了当时两国政府的镇压，陈毅等100余人被遣送回国。在经历一番爱国运动斗争之后，陈毅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

22岁的聂荣臻这一年生活出现大的转折，同在法国参加勤工俭学的他投入到了陈毅等人参加的爱国运动中去。看到学友们为争取国家民族利益时付出的沉重代价，他内心极为痛苦。在斗争中，他不断思考着：祖国的前途何在？出路何在？他曾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学不成，死不归。”矢志学习科学技术报效国家。然而学生爱国运动，让他对“实业救国”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列宁学说中，他认识到想要救国救民，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1922年，聂荣臻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

选择中国共产党，跟着党干

我国近代军事改革的主要教训

□谭小龙 何 荷

近代以来，我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相继经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三个政权。以“中体西用”为主要指导思想的晚清军事改革，虽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由于出发点局限性较大、设计不全面、措施不系统等综合原因，未能改变近代中国被列强欺辱压迫的整体格局，教训十分深刻。

指挥体制改革徒有其表,效能发挥低下

从19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随着南北洋海军的不断壮大，清廷逐渐重视起海军的领导指挥问题。一些开明的洋务人士认为，改革领导体制是推动海军健康发展的关键，提出应新设机构对全国海军进行管理，得到了清廷的肯定和支持。北洋系代表李鸿章虽赞同设立海军衙门，但其并非是想推动中央对海军的统一领导，而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通过总理海军事务衙门集海军大权于北洋。由于沿海各督抚的抗拒，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虽最终成立，但对海军的领导管理流于形式，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水师实际上仍然各自为政。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伤亡惨重万分危急之际，南洋系代表张之洞不仅2次拒绝清廷商调南洋水师支援，反而提出应向英国借款增购军舰，与北洋水师在途的新购舰船一起，全部交由南洋水师指挥，通过攻击日本本土和朝鲜沿岸实现“围魏救赵”，最后实际上间接加快了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

新型军队建设缺乏统管,沦为军阀私产

甲午战争惨败后，清廷认为“欲立国于20世纪之世界，非讲军制不可”“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第一要

著”。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以德军为范本编练“新建陆军”，与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并称北洋三军，逐渐扩展至北洋六镇。同期张之洞同样效仿德军在南方成立“自强军”。从1895年12月起至清亡，清军共编练有14个镇、18个混成协 and 一支禁卫军共14万人。1903年，清廷改革军制，成立练兵处作为编练新军的最高机构，并在1906年并入陆军部（原兵部）。但是，由于新军的编练主要依靠各省，所需经费也由当地政府提供，朝廷对新军的领导和指挥受到极大影响。根据1911年统计数据，贵州、湖南、四川、江西、奉天的新军开支占省财政支出的1/3以上，安徽、甘肃、云南和广西甚至达到1/2以上。在此情况下，随着新军实力的不断增强，朝廷对新军的控制力却日渐削弱，特别是北洋新军，“只知袁大帅，不知有朝廷”。各路军阀由此兴起，坐拥山头割据一方，给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深重灾难。

军事技术引进较为盲目,军费浪费严重

鸦片战争失败后，革新派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尝试，积极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武器装备和制造技术。19世纪60年代以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建船政局、金陵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数十家近代兵工厂陆续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与仿制，加速了清军的武器装备更新。19世纪末，张之洞不惜挪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经费，要求湖北枪炮厂购入能够生产9种不同口径速射炮的德国机床，并于1899年成功仿制格魯森57毫米山炮，而此时西方国家军队已开始批量装备使用法式液压气体式复进机或德式液压弹簧式复进机的架退火炮，射速、射程和

杀伤力均有较大提升。由于产品刚下线性能就落伍，所需原材料又多从海外进口，根本达不到练兵处《陆军枪炮口径等项程式》所提出的射程大于5000米、每分钟15发的硬性要求，导致该炮只生产了480门就被迫停产。海军装备同样如此。19世纪70年代末，清廷盲目相信西方舰船品质，委托中间商采购了18艘西方已开始淘汰的“蚊子船”，由于舰船炮重船小、行驶缓慢，舰船回国后只能大部分封存，留下少数几艘在浅水区执行防御警戒任务，高达400万两白银的购船款白白打了水漂。而这一时期的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完全可以制造价格比之优惠且性能与之相当甚至超出的舰船。除此之外，各水师的舰载火炮也没有统一的标准，进口、自产混杂且弹药不能通用。日本在甲午战争结束后总结经验时，也将清军枪炮弹药制式繁杂、作战时难以持续形成战斗力，作为己方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原因。

军事规章制度落实不力,条款形同虚设

1866年，直隶总督刘长佑曾为直隶“练军”拟定营规15章150余条，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曾国藩接任直隶总督后对此不屑一顾，批驳“虽士大夫不能驟通而全记”，使得该规定没过多久就被废弃。1874年至1875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动海防大讨论，数十名督抚大臣先后上奏发表意见，对清军纪律不严和赏罚不明表示担忧。虽然有人提出要修订法律规章“去繁就简”，但并非是想打造“法治”环境，而是想替“人治”去除法规障碍。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对北洋水师的船制、官制、俸饷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北洋水师众将领并未认真执行。李鸿章也表示“武

夫难拘绳墨”，执法不必太过严格。1904年颁布的新订营制饷章严格规定了官兵的薪金待遇，但克扣官兵粮饷、盗卖军用物资甚至吃空饷之事仍然层出不穷，形成了中高级军官贪污腐败，下级军官剥削克扣士兵，士兵再通过战场掳掠和搜刮百姓找补的畸形现象，清廷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官员甚至认为，只要能保证官兵战场舍命拼杀即是合理，是否违背法规制度则不用在意。此种氛围下，近代中国效仿西方军队制定的众多军事规章制度，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反而因旧制难度、新制难行给军队造成了混乱。

尊崇军人之风未能形成,损伤官兵士气

近代中国军队的中下层官兵多出身于农民，甚至不乏一些匪徒和罪犯，社会主流瞧不起从军之人，不少军人也怀有较强的自卑感。淮军中担任文书的多是科举考试失败的文人，为维持生计不得已才进入军营。强烈的自尊心促使他们坚持身穿大褂而不着军衣，以示自身与军人的本质不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斩断了广大文人应试做官的奋斗途径，此时明显高于旧式绿营的新军待遇，吸引了大批文化青年携笔从戎，北洋、南洋、湖北都出现了文人从军热，官兵综合素质出现了质的飞跃。1906年和1907年，张之洞在湖北新军中举办了2期学兵营，共培训学员1600名，有效提升了官兵的军事和文化素养。由于清廷高层只将军队视为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没有从国家层面就提升军人的形象地位开展必要的宣传和引导，众多举措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民众对军人的“莽夫”印象。这也是造成晚清时期中国对日作战败多胜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青化砭战役：西北野战兵团的第一次大捷

□曹晓辉

保卫延安作战的部队经过6天战斗，歼敌5000余人，然后主动放弃延安。3月19日，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后，认为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是“仓皇北窜”。毛泽东充分利用敌军急于寻找我军主力部队决战的心情，指示彭德怀、习仲勋派少部兵力佯装向延安西北撤退，主力部队隐藏在延安东北方向待机歼敌。彭德怀令一部兵力佯装大兵团向延安西北的安塞撤退，大部队隐藏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

彭德怀、习仲勋统筹西北野战兵团作战。为了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分散孤立之敌，针对胡宗南的防御部署，彭德怀、习仲勋制定了严密的作战计划。1947年3月20日，西北野战兵团抵达青化砭以西的梁村。3月21日，因敌占领延安后动向未明，彭德怀要求各兵团力求隐蔽。3月22日，彭德怀得知敌第31旅于24日前进抵青化砭的消息，决定以伏击战歼灭该旅，制定作战计划并上报，得到毛泽东的复电批准。

3月23日，彭德怀对西北野战兵团各纵旅进行具体部署：第1纵队集结于冯庄、郭家庄、梁村地区；第2纵队及教导旅集结于阎罗寺、胡家河地区；新编第4旅集结于二崩渠、常家塔地区。24日拂晓前，第1纵队第358旅进入阎家沟至白家坡间沿小河以西地区，一部部署在曹家咀及常屯以西的高地，担任阻敌前进的任务，主力部署在小寺沟及林坪以西高地；第2纵队及教导旅于青化砭至房家桥公路以东地区设伏，教导旅部署在石绵羊沟以东隐蔽，第2纵队主力部署在寨子沟、窑子沟以西的高地侧后隐蔽，待敌后卫卫通过房家桥后，首先以一部向惠家砭方向出击，断敌退路，

阻敌增援，主力及教导旅由东向西猛烈突击。新编第4旅部署在青化砭东北及赵家沟以东及南高地隐蔽，待第2纵队及教导旅打响后，即向青化砭猛烈出击。

为了确保战役胜利，彭德怀、习仲勋指示西北野战兵团封锁作战消息，隐蔽作战企图，命令第1纵队独1旅为战役预备队，担任向延安、安塞方向进行警戒、封锁消息的任务。此外，西北野战兵团要求各部严密伪装，在24日拂晓前进入阵地；在敌人搜索范围之外设置伏击地区；观察及通信人员要穿便服；部队需携带一天的饮水及食物，减少阵地上的人员来往；战争未打响前，部队需沉着应对，避免被敌人的侦察和欺骗动作迷惑，等等。青化砭战役中，西北野战兵团行动隐蔽，主力6个旅2万余人，在距敌只有六七公里的地区设伏2天，敌人竟未发觉，对伏击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速歼顽敌，取得大胜。1947年3月21日，胡宗南以整编第1军第1师、第90师等共计5个旅，由延安向安塞疾进，另以整编第27师第31旅由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担任侧翼掩护。24日，敌军主力进至安塞，却未找到我军主力。原定在24日抵达青化砭的敌第31旅因在拐磨补给粮食，当天未动。彭德怀、习仲勋认为，胡宗南为保障主力部队进犯安塞时的侧翼安全，必定要派兵控制青化砭，遂命令西北野战兵团各纵旅仍以伏击姿态继续隐蔽待机。

3月25日拂晓，敌第31旅由拐磨向青化砭前进。其先头部队左翼有便衣侦察分队沿林坪以西高地搜索前进，右翼约1个连的兵力沿公路东侧

高地搜索前进，敌人主力沿公路前进。约10时，敌人先头部队进至青化砭，后卫通过房家桥，完全进入西北野战兵团预设的伏击地域。按照预定计划，我军向敌第31旅突然发起猛攻。新编第4旅及第1纵队第358旅一部向敌先头部队猛烈攻击阻其前进，第2纵队之独立第4旅一部向惠家砭方向出击，切断敌人退路。敌先头部队妄想抢占小蒜沟以西高地及青化砭东南高地的土寨子，西北野战兵团第358旅第8团向小蒜沟出击，将占领小蒜沟以西高地的敌人迅猛歼灭。敌主力企图抢占石绵羊沟两侧高地，西北野战兵团向敌迅速冲击，将敌部署打乱，并采取斩断尾、两翼夹击的战法，最终将敌全部压缩于石绵羊沟内。经过近2小时的激战，西北野战兵团全歼敌第31旅旅部及第92团共2900余人，俘虜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桂昌、参谋长熊继宗，缴获大量装备和辐重。

青化砭战役的胜利，成为稳定西北战局的重要开端。青化砭战役与其后的羊马河战役、蟠龙战役并称陕北的“三战三捷”。这三战，打破了国民党军3个月内结束陕北战事的企图，稳定了西北局势，在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